

V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 504 卷

補充參考  
請勿發表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六年之蘇聯

[紐約時報記者愛金生作於八月五日美國生活雜誌譯]

001 - 2 1946

如欲與蘇聯政府建立切實可行的關係我們先要放棄友誼觀念友誼一詞有密切聯繫與政治讓步兩層意義這對蘇聯是用不到的不可能也辦不通的俄國以互具二字來稱其政府蘇維埃的政府互其實為一種政治的機械人與人之間的友誼若此你與它派諒得太遠了。

從大體說俄國人民很值得欽佩他們真誠懇實而勤於工作你可以信任他們的力量才智與勇敢然而我們與俄國人民之間却站着一個蘇聯政府。雖則管着民主的招牌它實際是極權政府所謂勞動階級獨裁實際上其黨政治委員會十三個委員的獨裁而已。

蘇聯之內並無自由但就我觀察所得政府並非違反民意的它並非腐化的政府並不以任何集團的私人利益置之於國家利益之前。雖也有內部的不安與不忠例如最近處刑的工廠貪污案以及克利米亞契契真英格而共和國的反叛等就我所得的印象蘇聯人民大體都信任與尊重政府領袖的知慧與權力。正像美國或其他各國的人民那樣蘇聯人民也得到了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然而蘇聯政府的性質乃是傳導權力的一架機器傳導到蘇聯範圍之內以及其勢力所及的國外地方任何國家如願以友誼與它去相處必敗無疑。我們諒蘇聯

人，但亦非明文我們最大的希望不過數年的武裝和平而已。

第二頁

凡是美國利益所繫的地方，應當於相對的方向，施以同樣的權力。以此處置國際關係，誠屬違反潮流的方法。但蘇聯政府的精神根本是反潮流的。我們從它對待戰敗國家以及蘇軍在中國東北的行動都可以看出來。蘇政府習慣於用暴力施諸國內，於是本能地認為處置國外事務也要用暴力。

凡是看到蘇聯施及暴力的西洋人，覺得它那股機械的力量摧毀了反對者，建立了政治的基礎而使人民就範，都有些震驚。它於服從與不服從之間，毫無沒有容情的餘地。從西洋人對於「民天」詞的意義說，沒有容忍就沒有友誼。

俄國人為何這樣的難於相處呢？這有許多理由。俄國領袖大都從敵意環境中艱難革命而獲得了權位，所以他們仍舊信任一九一七年使他們成功的那種方法。這就是理由之一。帝俄時代也是一個專制而嚴刑峻法的國家，革命分子須在嚴密的紀律之下維持其組織，並且養成子秘密活動的精巧技術。嚴密紀律使他們獲得權位，於是他們相信現在發展權力亦必借助同樣的方法。

他們而且還相信一個不良的理論，認為目的可以使不正當的手段成為正當。或許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未解放勞工的奴隸地位，而把他們淪為極權主義之下的奴隸身。心雙方都受壓迫。

革命的進行，借助於特種計劃的戰爭，以及隱瞞、秘密和暴力等手段。環境使革命的人，現在已不是破壞法律者，而是創造法律者了。他們自可寬恕一些他們雖是如此做了，但有許多應有的傳統方法仍舊存在。他們仍用秘密來處理國事。蘇聯國民對於政府的特事，並不比外國人認識得更為清楚。

有時他們知道得還不如外國人多，因為有些蘇聯國內所不知道的消息，却從外國的途徑透露到了國外去。蘇維埃革命最激烈的時期雖已過去，而暴戾的手段仍舊存在。無人知道現在有多少萬的政治犯在監獄裡或在流放中。據估計其數量之多，在八十萬至一千五百萬之

間。蘇聯所需應付的內部危機與內部問題之多，絕非世界上任何政府所可比擬。它進行工業革命同時還要顧到政治革命以及迅速有效的教育人民。

他們認為如放渡過難關處事必須秘密而迅速則不惜運用暴力。這種心理它自然也施諸附庸國家。雖則附庸國家的人民比較地不習慣於受外國人的此種待遇。我們對蘇聯關係所接觸的對手，都是孕育於革命環境中的人物。有的是積極參與者，而沒有一個人不是革命的信徒。

觀天蘇政府在其廣大國內所獲成功外國人就不難瞭解。蘇埃領袖對於自身的安全如何特別的警覺着。史達林是去不保獲得最嚴密的人。蘇聯人民和外僑必須隨時攜帶護照或身份證。這種證件是常常用得到的。我們認為戰時的安會措置在蘇聯是平時的日子常措置。你如要去參加巡場的，一個紀念會，你得出示特別通行證及護照八次之多。每次都有人細細閱讀並對驗其片。

蘇聯內部發生的事情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澈底知道的。正像保爾·溫脫頓氏所說的那樣。大家對於蘇聯不過是大概小惡程度的差別而已。雖則傳說烏克蘭某種方面（這是蘇聯報章所常用名詞）有增加監視的不安現象，但據我所知蘇聯並沒有積極而有組織的反抗政府行動。

所謂某種方面據說是戰時所付代價最高者。他們把自己所受的災害歸罪於政府。彼得羅維奇在共產黨部去年十二月發表的提議，據猜想係出於故意的放火。烏克蘭有積極的反抗運動。在俄國的其他部分回教徒並非人人滿意中央政府的。但中央政府有力彈壓反抗團體。就一個外國人的觀察蘇聯領袖的地位很強固。他們領導國民戰勝了效率很高的現代化的敵人。共產黨則自居勝利的全功。而對於盟國擊斃德國的供獻，彼徒加以或多或少抹殺。他們且自以為給了日本以最後致命的一擊。

人民對於生活艱苦雖有怨言，但似乎都信任他們的政府。但其性質遲不到政治委員會委員們認為安全的程度。俄國是落後生活艱苦而現縱發散的國家。其領袖急急欲其進步。自有許多不愉快的任務要履行。

有許多沉重的責任負擔要加在人民身上。他們無疑地覺得環境需要他們在上面有行動的自由，不受批評，不受反對及不受分析。他們的動機雖然可疑，可是手段則頗光明。其在國外的行為為英國內者如出一轍，只是在國外他們沒有統制報紙及統制消極，反對的方法來保護而已。

蘇聯領袖的惡味亦為我們英之相處的困難之一。他們很少人出過國，經過了多年的隔離，以及對外的不愉快的經驗，他們對外國造成了一種猜疑的心理。蘇政府的精神是排外的，自從一九三六年的流兵肅軍以來對於外國人就有一種無明的恐怖，把他們都看作蘇聯的間諜與敵人。

對外國人發生間諜或積疑問題如外國的事情一概視之為不忠蘇聯。甚至領袖們亦不能例外。領袖們如果與外國人相處得很好，或是贊同外國的主張，乃是自取戾疾，他們或許在自己明白以前，早已送進監獄了。

甚至史達林一般人也認為他比較富於常識，但他也不懂自由與民主，加之他受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使他憑着成見，以及蘇聯外交官等不完整的情報來判斷外國。

蘇聯領袖吃了他們對外隔閡的虧，他們難從從國外得到大宗情報，但無分析經驗。一生都生活於鐵幕的後面，他們不能以我們所認為正常的基礎去應付外國問題或外國人。與外國人接觸既抱猜疑的心理，就產生了罪疚的幻覺。女界和平正在動蕩之中，因此發生了許多不必要的摩擦，這是最可痛心的事情。

去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之後，許多外國人都認為蘇聯的政治委員會曾作深思熟慮的決策，恢復戰前狀態，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外圍看作必然的敵人。不論這種看法的正確性如何，雖然在蘇聯國內，由此可造成一種空氣，使於獨裁者的統治。人民如果相信，外界有組織地在進害他們，這種人民更容易治理得多。正像我們戰時經驗告訴我們的那樣，人民如果覺得為救國而工作，那末工作成績一定要好些。

蘇聯的氣氛是反乎常態的。由於國內外文化交流諸多隔閡，因此蘇聯文化空氣已陷入停滯而不活躍的狀態。在檢查制度的鐵幕背後，人們對於該談和事實，情緒上的反應是很神經質的。所發表的新聞報導往往被破壞時事背。景甚遠，而且為適應特殊環境起見，不惜將事實加以杜撰或篡改，因此各種新聞，又以真實的姿態暴露無遺時。

人們往往為之震驚不已。

當邱吉爾在富爾登演說後若干天，蘇聯並未將其演辭予以披露，這也許是蘇聯領袖們蓄意將其秘而不宣，但後來終於在報上發表，同時附加了政治性的評論，莫斯科民眾舉手之下，不勝震驚惶恐，似乎原不彈將於夜半以前向他們頭上拋擲一般，處於此種低氣壓之下，蘇聯人民的情緒激發是急遽迅速，而且有些動盪不安。

經歷了六次世界大戰的我們，都深信唯有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合作始能避免災禍，而莫斯科當局却以為去界性的思想文化聯繫至極需要，其實莫斯科沒有新的思想，一切陳舊的思想渣滓經常地傳播著，各種報紙往往在同一天，以幾乎相同的筆調報導同一的新聞，除了若不一鮮有的例外，各人所寫的東西簡直如出一轍，大都雷同。

蘇聯的傳訊政策——將外人稱諸國境之外，使敵倖潛入的外人孤立，限制其行動檢查新聞，甚至禁止新聞的發表等等——無形中使其文化變成一蕪生氣，落伍，小布爾喬亞式，而且庸俗不堪。

我不大懂得科學，所以無法批評蘇聯的工業活動，但我深知蘇聯的醫藥被為落後，根據個人觀察所得，我覺得他們在戲劇藝術和音樂方面的水準亦極低下，我想很多蘇聯作家優伶和音樂家們，也必有相同的感覺，此之蘇聯藝術缺乏生氣和活力，可以說是一支復古的奄奄一息的藝術潮流，在政治統制的高壓底下個人活動毫無發展餘地。

對於蘇聯藝術，寄以心嚮往之的期望，似乎是很合適邏輯的一件事，但依我看來，蘇聯藝術也和我們一樣的充滿着低級趣味的情調，他們從未產生過三意味雋永的不朽作品，缺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雙管齊下已注定了新思想無法抬頭的命运。

在這種不正常的變態空氣中，蘇聯人民的集體神經錯亂便變滋長了，而在我看來，蘇聯領袖們最顯著而激動的變態行為是普遍性的神經過敏，他們幻想着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在敵對他們，而且他們是被周遭的敵人包圍着，當然這是他們意欲對其它國造成迷惑，致其和敵對的不二法門，觀夫蘇聯所廣大的領土，強悍實力以及無窮盡的資源，這種恐

懼心理是大可不必的。假使善意和蘇聯親善相處的外人並不像目前這樣遭遇困難的話。

講到國外威脅，具有完整經濟和原子彈的美國是最為輕重之的。但是在國際方面若觀念和志趣有所差異，則蘇聯領袖們看來便是對蘇聯的一種侵略性的敵對行為，即在國內他們也是如此想法。任何蘇聯人民若反對史太林的政策，他便是國家的敵人。

美國人大都以為蘇聯領袖們是一羣熟練精明和真實性的人物，他們都隨時準備着他們的前程和目標。但我却懷疑他們是一羣俗不可耐的人物，在國內他們缺乏民主的經驗，而且都給國外的民主現狀所困惑而迷亂了。為了最神聖的馬克思主義三教，在國內戰爭，老毛的思想以後，他們竟視到國的吳三桂色思想為對蘇聯和其人民的叛逆不忠。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光輝燦爛的科學化思想，它已經把不合科學化的人類自然本性清除淨淨了。

蘇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姿態，在資本主義去界中力謀發展和擴張。這是維持國際間友好關係的重大障礙。依據共產黨方針，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若同樣霸持去界統治權，則蘇聯被侵略的危機永無消陰的一天。換句話說，它的安全便無法獲得保障了。雖然蘇聯在過去曾和資本主義國家（當希特勒在西方作戰時的納粹德國）曾包括在內）維持過高層友好的關係。

但現在共產黨的方針已改變為這一種理論：壟斷資本（蘇聯作家時常如此命名）是法西斯蒂的行徑，意欲維持法西斯蒂主義的中心勢力，而有毀滅社會主義的趨勢。

蘇聯報紙將美國描繪成一個殘暴的帝國主義國家，專以向全世界擴充權勢和蹂躪弱小國家之主權為能事。他們還說美國壟斷資本家威脅去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們。



當我在莫斯科逗留十月期間從未發現任何報章中雜誌發表過有關美國人具有優美性格之論調。英國也給描寫成一個災禍頻仍的國家。雖然社會主義已在英國、新西蘭、或澳洲獲得了權勢。這事實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格不入之情態業已瀰漫於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當我在莫斯科完畢了上述的任務以後我更深地覺美西方典型的資本主義因為它比社會主義更顧到人民而且尊重個人的自由。確保個人自由為此次戰爭之原因。而至今依然是世界體制中的最重要原則。照原理上講，社會主義為達成此志願之合理途徑。而且照我們在英國所看到的那樣，社會主義根本不一定要剝削人類的自由。

蘇聯包括很多民族以它這樣一個廣博而特然的國家若欲求整個繁榮共進，其社會主義確乎是對天下約的唯一制度。假使蘇聯的社會主義能與現行蘇聯極權主義有所迥異的話，則人人將更加加以注意。而希望蘇聯國內推行社會主義能給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解決各種問題有所借鏡。

事實上任何有思想的人都重視社會主義。因為不論社會主義在蘇聯有何成就，其對於世界各國的影響至大且鉅。各國人民都急迫地期望求合乎理想的某種經濟制度。他們對於蘇聯人民生活之窮困漠然無知，但深信蘇聯已實行了最理想的經濟制度。事實上，若以我們的民主主義標準比較起來，蘇聯根本沒有解決任何有關自由之問題。

對於崇拜社會主義理論的人們，蘇聯的繁榮與非但迷惑而且恐怖。但依管見所及，社會主義本身更非蘇聯與英美不協調的癥結所在。若其餘各項事情協調一致，則英美可與蘇聯相處甚安。實非德蘇敵對情勢所可比擬。

但此非蘇聯領袖們的出發點，他們以去來世界的主宰者自居，依照他們的意見任何事情都一一以他們的意志為依歸，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蘇聯領袖們都把自己當作整個世界的原動力，他們深信正在波蘭和巴爾幹諸國行使神聖的任務，雖然各該國未開化的人民都報以驚人的抗拒。

在目前和英美政府進行外交折衝之際，蘇聯領袖並不確信其對象為愛好和平的人民大眾的真實代表，他們以為英美政府所加於其人民的是政治性的奸猾和壟斷資本的詭計。

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二者實為同一名稱）是否在英美推動革命性的波瀾至今雖尚未能確定，但他們以資助並顧問法國共產黨的方法去干預法國之政治則為較一般的事實，他們以為社會主義是國際和平的最穩固因素，這是蘇聯在國際外交方面造成固執態度的唯一原因，在他們看來，反動份子意欲挽救行將覆亡的經濟組織等任何其背離蘇聯政策之行為實為去界和平的威脅。

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科學而是一種宗教，其推行受教義共理性的支配，信仰這種主義的人必須毫無保留地接受它，蘇聯對於外國人那種宗教式的歧視，是在國內苦心孤詣地培養起來的，每一個公共場所懸掛的列寧史太林的照相，即是他們所崇拜的新上帝。

蘇聯的宣傳文字充滿着宗教式的熱情，感謝決心共犧牲等詞藻，莫斯科不僅是蘇聯的首都，同時是共產主義信仰者的聖城，列寧為父，史太林為子，表示這種宗教式信仰的通訊占據了報紙的重要篇幅，它們莊嚴地宣稱蘇聯是去界上最幸福的國因為它有唯一的真理信仰，將來必定滋養着無窮的愛與快樂。

當蘇聯代表與我們的代表相晤於會議席間的時候，他們好像與異教的罪惡分子相周旋，彼得和冷，他們不能不犧牲一熱神聖的教義，蘇俄人共不崇拜馬克思、列寧及史太林者之所以不易商議，其結果來原即在於此。



我們與蘇聯領袖有一點是由衷地同意的，即維持和平全賴美蘇間的和平關係。觀夫蘇聯遭遇問題之多，以及瘡痍未復，倦於戰爭，他們是渴望和平的。戰爭的恐怖，他們比美國知道得更清楚。他們雖不十分推崇我們對於獲得勝利所貢獻的功績，但我們沒有理由抹殺他們的功勞。其燦爛的作戰紀錄，我們也不應忘記蘇聯人民所受的苦難，而且他們至今仍在苦難中。

然而，為了儘量排除不必要的感情因素，我們對於蘇聯領袖，切不可認為和平關係即等於友誼。美國人往往以為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民都信任我們，喜歡我們，羨慕我們，或許還想向我們借貸。

對於蘇聯領袖，最後一點或許是對的，他們想向我們借錢，以加速五年計劃的進展。美國人或許以為把錢借給蘇聯是友誼的姿態，蘇聯領袖都沒有這種感情的想法。

借款與英、中、法、波及別的國家之後，而不借給蘇聯，他們或許會解釋為這是一種昏庸不負責任，隨便浪費，而由反動份子主政的國家而認定為敵意行動之一。將救濟物資運赴一個有排外政府的國家，這政府除了曲解美國人的急公好義之外，決無別的反應。住在德軍蹂躪區的蘇聯人民，渴欲援助，他們感銘地接受了我們的救濟。

但我們切不可希望救濟物資能改變蘇聯政府嚴峻而若即若離的態度。事實上這種態度徒然使其人民斷絕國外的援助。蘇聯的孤立主義，絕對不會因外國的慷慨救濟而澈底改觀。說句老實話，世界上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怨恨美國人這種神采奕奕的紳士儀態。

憑藉剩餘物資和舊衣服，美國決不能獲得友誼，而且也不能打破檢查制度的鐵石壁壘。更不能樹立二國間科學家、教授、藝術家、其學生的自由交換，或者容許自由不羈的美國人在蘇聯境內到處遊歷。

在我們看來，這些事情極為正常，可以說是促成相互諒解的基本條件。但當蘇聯在特殊環境之下發展其社會主義之際，他們的苦心積慮的政策是排除外國的勢力。

雖然蘇聯正在向全世界挑戰，但它絕無能力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相競爭，也不容許其人民知道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非但有個人自由，而且

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假如其人民能其西方一般人民有自由的往來，則以「壟斷資本」壓榨工人的荒誕的<sup>宣傳</sup>，不難烟消雲散。

縱令締造融治關係的途中充滿着障礙和荆棘，也不管蘇聯曾從聯合國會議場中再三憤然引退，事實上蘇聯並不希望在整個世界中失掉朋友，他們也不願蔑視世界公意，他們有時因國外的猛烈抨擊而大為驚駭。

因在國內慣於專制性的警管統制，所以南波蘭和巴爾幹諸國較為溫和的極權專政引起人民抗議的呼聲，以及英美人民對「壟斷資本」發出了正義的忿怒和咆哮時，蘇聯人民乃驚奇不止。國外一致的公憤意迫使蘇聯軍隊從伊朗退回來，雖然當時和目前我們都沒有具體的行動去制止蘇聯將伊朗歸入附庸國家行列之內。蘇聯有軍隊和本能，可隨時將伊朗據為己有，唯如此做法，全世界將一致地與它敵對了。

去年秋天正當勝利之際，蘇聯對土耳其發動了神經戰，當時蘇聯和目前一樣，在土耳其鄰近駐有強大的兵力，它可能藉軍事行動將土耳其從其統治者手中「解放」出來。但土耳其的神經戰為強固，國外輿論也蠢蠢欲動，同時美國也溫和地參加了神經戰，派遣一艘強力的戰鬥艦直駛土耳其，載着前土耳其大使的遺骸作為一種威懾的啓示。

壟斷蘇聯已於其程序表中剷掉了伊朗和土耳其，是最愚笨的想法將來也許有一天蘇聯政府為維持其聲望起見，付以相當代價，更或許因整個近東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而減低其應付的代價，但在目前蘇聯不至於蔑視世界上其它國家的輿論和公意。

當我在莫斯科時，我時常在電文中拘謹地插入如下的諷刺論調，以試驗檢查人員之是否戒懼：「蘇聯外交政策是極合於人情的，蘇聯希望與全世界維持友好的關係，並且到家無往而不利。」檢查員往往敏感地刪除了這些惡作劇的字句，對於此種諷刺性的遊戲，他常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些語句雖含有諷刺的意味，但其中蘊藏着無限的真理，合理抑或悖理，這二個問題，對於極權政治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不甚重要的。但日前蘇聯實不願波動國際漩渦，以爆發另一次戰爭。

我在那裏曾提出在國際外交方面與蘇聯難以相安；原由我們雖非朋友，但亦非仇敵，可是無論如何，當我們向世界上其它地方擴張權威時，美蘇二國實在是極不相容的競爭者。馬克思主義根本是一種全盤性的世界計劃，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蘇聯領袖們對於美蘇間這種微妙的關係當然看得很清楚，因此同時我們也應透視全部底蘊而顧慮到將來，在我們的隱隱應深地刺刺着他們的觀點所在。

我們千萬不應由於蘇聯之落伍及其生活水準之低下，而自感滿足，因為蘇聯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囊括廣闊的領土，形勢上掌握歐亞大陸的樞紐，它有富饒的物產，和比較無限制的人力，掌握極權政府的蘇聯領袖們，可使其人力（包括女人）獲致最大的效率，其工人的優異成績，也將其日俱增。

觀夫蘇聯人民的愛國其盡忠大體說來，他們非但強悍而且穩當，缺乏自由並不使他們感到痛苦，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瞭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依我個人信仰說來，自由較獨裁更有創造力，我想美國的顛沛戰績能證明此言之不謬，現在戰爭已過去了，我們不必一再為我們在戰場上和工廠中的功績而慶賀，但至少我們有此自信：一旦我們的自由遭受威脅，我們全國便能聯合起來向同一目標邁進，雖然我們的人力較蘇聯為小，但我們至今還是很強盛的。

我們也有富饒的物產，而我們的地理形勢也是很險要的，在國際競爭中，我們最大的資產是高度的工業技術能，以個人比較，美國人在工廠中和農廠場上的生產力十分強盛，但在平時，由於其它人生事務之故，我們沒有最高的生產量，我們也無法保證人民獲得經濟上的穩固。

這是千真萬確的，雖然對於各項工作人民無自由選擇之權，而且每項職業都是粥少僧多，但在蘇聯境內從未發生過失業的現象，在強有力的蘇聯競爭時，我們應保持至高無上的優越力量，我們應飛躍精進地增加生產，和提高生活水準，我們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獲致最高額的生產量，但同時不能違背人權宣言，但試問如何始能謀大眾福利，而

且同時不許剝削人民的自由？我一個美國公民實在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欲求答案，蘇聯的現狀足以說明一切。

在莫斯科逗留了十個月之後，我於一月前沮喪地動身回國，由於個人  
經歷和觀察所得，我找不出和蘇聯之間有誠懇而興奮的關係之存在，簡  
單地說，假使能和這些蘇聯人民友誼地往來，則情形較美滿些，這是多  
麼遺憾的一件事。

我與妻乘坐一架蘇聯飛機，從莫斯科一個優美的飛機場起飛，取  
道基輔，直飛敖得薩。該機系陶格拉斯式運輸機，適些許多美國人聞  
於蘇聯飛行的報導相反，此次飛航意外地舒服，機師駕駛技術堪稱高  
明，我們和其他旅客談笑風生，他們相互間有一種溫暖的有似一家人的  
無情感，後來似乎把我們也當為他們的一家人了。

他們不時向我們暗獻熱忱，情緒之中似乎表示我們雖不能參加他們  
的家庭，但我們並不是被排斥的，這些雖是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們是我  
其政府官吏以外的蘇聯人民欣悅相會的寶貴經歷，這些小事情也證  
實了我們的信念：蘇聯人民是篤實而仁慈的。可是以整個國家言，我們  
美國遠得在苦澀而緊張的氣氛中，和蘇聯周旋下去，這是一件憾事，或  
許也是一齣悲劇，但我們得如此做去，捨此實無其它途徑可循。

完